新疆西域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丛书

洮岷花儿与西北民族民俗文化研究

柯杨 武文 著



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M
J616.2
38

兰州大学 211 工程资助项目

洮岷花儿与西北民族民俗文化研究

柯杨 武文 著



凯里学院图书馆
0761925

凯里学院图书馆
藏书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汉萍
装帧设计:薛　磊
责任校对:张杰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洮岷花儿与西北民族民俗文化研究/柯杨　武文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
(敦煌西域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丛书)
ISBN 978-7-01-010808-7

Ⅰ.①洮…　Ⅱ.①柯…②武…　Ⅲ.①花儿(音乐)–民族音乐研究–甘肃省
②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研究–西北地区　Ⅳ.①J616.2　②K89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1193 号

洮岷花儿与西北民族民俗文化研究
TAOMIN HUAER YU XIBEI MINZU MINSU WENHUA YANJIU

柯 杨　武 文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25
字数:24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0808-7　定价:3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言



丝绸之路悠久的历史文化，西域多民族别具特色的民族文学、宗教文化、民俗风情，一直是兰州大学文学院予以特别关注的领域，且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柯杨先生和武文先生就是诸多为敦煌西域文学、西北少数民族文学、民俗文化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中的两位。洮岷花儿、西北民族民俗文化分别是柯杨先生和武文先生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柯杨先生多年来对花儿和“花儿会”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花儿是“流行于甘、青、宁、新诸省区的一种民歌”。花儿的起源有多种说法，柯先生认为缘起于明代。关于花儿的得名，“有人认为歌词中常将青年女子比喻为花儿而得名；也有人认为这种民歌多用花儿来比兴，故名。”柯先生赞成后一种观点。花儿“因格律、调和地域的不同分为‘河湟花儿’和‘洮岷花儿’两大类”。柯杨先生认为，花儿广泛流行于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区，深受汉、回、藏、土、东乡、保安、撒拉、裕固等八个民族的人民喜爱，“是在各民族文化相

互交流的过程中发展、演变的”，花儿如此，西部的语言、艺术、民俗风情也是如此。所以对西域文明的深入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对于西部多民族地区和谐、稳定、祥和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本书所选为柯杨先生和武文先生关于“洮岷花儿”和西北民族民俗研究的部分成果。两位先生都是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的知名学者，名人辞典、报纸杂志都曾不断刊出有关他们的科研成果介绍，在这里，为避免本书选编的偏颇，我们将有关两位先生的介绍文字逐录于下，以便读者对他们的科研成就有更为全面的了解，以便有兴趣的读者继续关注他们的其他研究成果。

柯杨，兰州大学资深教授。长期从事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教学和研究。曾任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兰州大学中文系主任。发表学术论文 120 余篇，出版学术著作多部。主编《西北民俗文献》（26 卷）、《中国民俗故事集》（上下册）、参与《中国风俗辞典》和高校教材《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概论》的撰写。1990 年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列入《世界名人词典》，2001 年荣获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颁发的采风成果奖，2007 年荣获文化部颁发的“非物质文化保护先进个人”奖和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颁发的“山花奖·民间文艺成就奖”。

武文，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中国文化思想以及中国西部原生态文化等的教学科研工作。出版有《宏观文化人类学》、《秦陇文化论》、《甘肃民间文学概论》、《裕固族文学研究》、《文化学论纲——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解读》、《中国民俗学古典文献辑论》、《中国民间文学古典文献辑论》、《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甘肃民间故事卷》、《中国民俗学大系·甘肃民俗》等十余部学术著作；参编《中国歌谣集成·甘肃歌谣卷》、《中国谚语集成·甘肃谚语卷》等大型丛书 30 余部。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现任海南大学三亚学院人文与传播分院院长。

本书的出版，人民出版社杨美艳女士、陈汉萍女士付出了大量心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她们的敬业精神让我们深为感动。在书稿的打印、校对中，杨许波博士、田多瑞、牛思仁几位硕士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庆振轩

2012 年 4 月

目录

1 · 前言

上 编 洮岷花儿研究 柯杨

3 · 花儿溯源
18 · 花儿流布的区域及其格律
24 · 莲花山花儿程式论
38 · 听众的参与和民间歌手的才能
——兼论洮岷花儿对唱中的环境因素
51 · 洮岷花儿与农家生活
60 · 洮岷花儿中的祭祀性歌谣
75 · 具有代表性的回族花儿
——“出门人的歌”
84 · 新疆回族传统花儿琐议
96 · 苏皖古俗在甘肃洮河流域的遗存
104 · 花儿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119 · 花儿研究在国外

下 编 西北民族民俗文化研究 武文

129 · 秦陇宗教文化的基本结构

142 · 德力兼容的社会型模：简论西王母的政治理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155 ·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裕固族的宗教信仰

159 · 格萨尔原型断想

——从裕固族《格萨尔故事》看格萨尔其人

171 · 裕固族神话中的原始宗教“基因”于民俗中的遗传

182 · 裕固族《格萨尔故事》内涵及其原型

191 · 宇宙建构的奇妙幻想

——裕固族创世神话漫议

200 · 尧乎尔文学对裕固族历史的口承与补正

210 · 裕固族民间叙事诗中的民族自我意识

——再评《尧乎尔来自西州哈卓》

220 · 东乡族蛙精故事探考

231 · 招“夫”养夫的调查与研究

上编

洮岷花儿研究

柯杨



花儿溯源



一、问题的提出

花儿是流行于甘、青、宁、新四省区的一种民歌，深受汉、回、藏、土、东乡、保安、撒拉、裕固八个民族人民的喜爱。对于这种民歌的大规模搜集与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以甘肃榆中张亚雄的《花儿集》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花儿的搜集整理工作成绩显著，研究论文也时有披露，这两方面，以青海、甘肃的工作搞得最好。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对于花儿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以及结构韵律的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应当说是相当出色的。但是有关花儿历史的研究，相比之下，就显得黯然失色了。到目前为止，关于花儿产生的时代，就出现过以下五种不同的说法。

一曰：花儿产生于原始社会。有人不分源与流，也不注意事物的特殊性，而是套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艺术最早产生于原始劳动的基本理论来说明花儿产生的时代，这显然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二曰：花儿产生于周朝。有人根据《诗经》在古代曾被人称为“葩经”（释之曰“花儿经”），或者认为花儿与《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在内容、风格与艺术手法上有类似之处，因此便认为二者之间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其实，民歌作为民间口头文艺的一个种类，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也不论是甲地的还是乙地的，这个民族的还是那个民族的。它们之间在思想内容、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共性，这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共性，乃是多种原因形成的。对这种现象进行比较研究，也是重要的课题之一。然而，共性的出现，并非全都是源与流的关系。对花儿产生的时代问题，如果不从更广阔的背景下去探求原因，而只是将某种与它近似的古代民歌拿来进行比较，轻易得出此源于彼的结论，恐怕是欠妥当的。

三曰：花儿产生于唐代。有人根据花儿中出现过“留下‘少年’的孙悟空，给世人宽心者哩”这样两句话，就推测花儿起源于唐代。我们说，通过作品本身所揭示的时代气息、社会生活和地理环境等特征来考察它的产生与发展，固然是一种可行之法，但仅仅根据歌词中的一句传说就下结论，却又显得过于仓促。

四曰：花儿产生于元代。有人从花儿结构上具有长短句的特征，以及花儿的曲调均以“× × 令”来命名，就把它同元曲中的“小令”联系起来，认为它产生于元代。这种见解虽不无可取之处，但仍因资料不足，也是缺乏说服力的。

五曰：花儿产生于清代。有人根据清代甘肃临洮诗人吴镇作品中“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的句子来论证花儿产生于清代。这条材料虽然十分确凿，但它只能证明乾隆时期唱花儿的风气已经形成，并不能说明花儿的产生年代问题，它的产生显然更早一些。

总括以上五点，可以看出，关于花儿历史的研究，目前还处于一种刚刚开始的阶段，多数论点证据明显不足，而且缺乏科学性。近年来，我针对上述种种说法，做了些粗浅的调查研究，似乎略有所得。下面我就花儿这种民歌的产生及其演变作一点初步的考证。目的无非是抛砖引玉，供有志于此的同行参考，以便使我们的研究工作能深入一步。不妥之处，尚希教正。

二、花儿产生的历史地理背景

要研究花儿的产生，首先要考证花儿的作者及演唱者——洮、岷、河、湟一带汉、回等族人民的来历。如果不对这一地区之所以形成多民族交叉聚居的历史原因来一番探讨，恐怕就无法真正了解多民族人民用汉语所创造的独特民歌——花儿的来源。

有的同志也许会说，当地各族人民是祖祖辈辈交叉聚居在这些地区的，有什么可研究的？然而，事实并不是那样。虽然，汉武帝征匈奴、逐诸羌后，汉民开始移居甘青一带。但隋唐以后，不仅中原多事，而且封建王朝对西北少数民族征伐不断，因此，人民生活出现过一个长期的不安定时期。至宋时，洮、岷、河、湟一带又成了吐蕃的势力范围，原先已开垦的土地，又大都变成了他们的牧场。其间原先定居的汉民几乎逃亡殆尽，而回、东乡、撒拉、保安等民族在当时尚未出现于这个地区。元代以后，汉民复又逐渐移居此地，以明初为最盛。

从明洪武年间开始，通过军屯、罪戍等办法，将江苏、安徽凤阳等地汉民，大量向洮、岷、河、湟一带迁徙。其目的，正如朱元璋“敕谕”中所言：“洮州西控番、戎，东蔽湟、陇，汉唐以来备边要地。今番寇既斥，弃之不守，数年后，番人将复为患。虑小费而忘大虞，岂良策哉。”[1] 不论军屯还是罪戍，当时均令戍边军士携带妻小。其用意：一是可以就地补充新丁，二是增加劳力以协助农垦，三是使军士们有家小牵挂而不致逃亡。有些戍边军士所携眷属，全家竟达一二十口之多，甚至还出现大部队先行，后由原籍亲属把军士们的家小送至戍地而完聚的情况。[2]

从《明史》、《太祖实录》、《国榷》等书的记载可知，明洪武年间，先后向甘肃的洮州、岷州、河州、临洮以及青海的西宁、碾伯、循化等地派遣了大量屯军，每次的数量少则几千，多则几万。这些屯军、罪戍者及其家属，后来大都定居戍地而未返回家园。他们正是目前洮、岷、河、湟一带汉民的祖先。例如，《洮州厅志·卷十·名宦》就有这样一条记载：“金朝兴，南京丝巷人，忠勇多谋，有儒将风。洪武十二年，太祖以朝兴为都督奉国将军，从西平侯沐英讨洮州番……弟鼎兴、建兴俱授卫指挥使，因家于洮焉。”

明初，连中书省官员耿复初、工部主事朱亮、洛阳知县徐兰以及名中医沈绎都因罪谪戍兰州一带，足见《明史》中“明初法严”，边塞地区的汉民“多由罪谪”的说法是可靠的。明代余继登的《典故纪闻》卷五中记载：“洪武间，镇南卫卒造官船，擅伐民树木为楼橹，民诉之。太祖曰：‘犖确之下尚如此，其他可知。’命斩其为首者一人示众，余杖之，谪戍甘肃。”这也可以作为明初向甘肃移民的一条旁证材料。顾颉刚在《浪口村随笔》中写道：“明洪武十二年，洮州十八族番民叛乱，征西将军沐英、奉国将军金朝兴奉太祖命率军讨之……朝兴弟鼎兴及建兴俱授卫指挥使，因家于洮，至今为临潭望族。当时兵屯人数必众，故今检当地大家之谱牒，类皆明初都督佥事、指挥佥事、镇抚千户、百户之后裔。然汉人势力所以得奠定于是者，则以有李达继其绩攸……予于二十七年五月到新城，李氏子孙持其画像来，幅大盈丈，而绢本已甚黯旧，慨然想见其遗泽之远云。”他还说：“河州人相传为南京大柳树巷人，洮州相传为南京丝巷人，俱谓自明初迁去，西宁人亦云然。”[3] 关于西宁一带汉民亦来自南京的说法，在丘向鲁所撰《青海各民族移入的溯源及其分布之现状》一文中曾有涉及，其中说：（明初）某年南京人士于上元时节耍花灯的时候，朱子巷居民异想天开，装了一个猴子倒骑马的灯。后被马后所闻，以为开玩笑竟开到马皇后头上来了，一怒之下，把南京朱子巷居民全部充军到了西宁。作者认为，这虽然只是街谈巷议的一种传说，不能作为可靠的史料来引用，但“西宁的言语与礼节，和南京有一部分相同，却是事实。”[4] 在柴萼所著的《梵天庐丛录》卷一中，也有一段文字说到南京人因上元张灯有影射马后事，被明太祖杀戮、充军的故事，只是没有明确指出充军到西宁。这可与邱文相互参照，以证明西宁人之街谈巷议并非毫无根据。因为，柴文所引资料，系亲自抄录于日本神户图书馆所藏明代秘史百余种之抄本，是比较可靠的历史材料。《皋兰县志》云：“除夕男祭于木主，妇哭于大门之内，说者谓有明之初，兰人自江南等省迁徙丁口者十居七八，妇人除夕遥祭母家亲属，天涯望哭，遂成风俗云。”顺便说一句，早在明代，南京就有“拔不了的卫籍”（意思是“逃不脱祖祖辈辈戍边、屯田的命运”）。[5] 这样的俗语流行，足见受累之深。时至今日，岷县老年妇女有时还骂男人是“你这个军犯”！

骂自己的孩子是“军犯娃”，大约也同明初的罪戍有着密切的关系。

上面这些材料，说的是明初汉民大量向甘、青一带移居进行屯垦的情况。那么，这一带除藏民之外的其他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又是何时出现的呢？通过历史文献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大体上仍然形成于元末明初。下面这几条材料可以为证：

《导河县志》云：“回族亦自有明以后，日渐繁盛，至今占全部二分之一，姓氏马姓最多。”

张其昀《甘肃省夏河县志略》云：“明初洮西多旷土，又募回民开垦，与汉民杂居，更有从哈密迁来者，即今循化撒拉回之起源。”

马鹤天《西北考察记》青海篇云：“撒拉回为中亚撒马尔汗突厥之后裔，于元明时代，徙至黄河上游之青海省循化县东南一带，人口约数万。”杨兆钧在其《撒拉之习俗》一文中，对于撒拉族东迁的时间，说得更为详细，他写道：“撒拉人明洪武三年五月十三日自撒马尔罕东来。”[6]

至于东乡、保安两族，也是元末明初聚居于这个地区的。这些民族的村落与汉族人的村落相交错，而汉族人数又较多，所以，才使汉语逐步成为各族人民都使用的一种共同语言。在这个基础上，用汉语创作并演唱的各族人民共同的艺术创作——花儿也才有产生的可能。

三、花儿这个名称的由来

目前，研究花儿的学者大都认为花儿这个名称，是由作品中男方对女方的昵称（如“我维下的花儿你没有见，万花中挑下的牡丹”之类）演变而来，亦即用来借代，作为整个民族的通称。最早提出这个见解的，当推《花儿集》的著者张亚雄。起先，我也觉得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但当我翻查了若干资料之后，又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

顾颉刚在他的《浪口村随笔·明初西北移民》中写道：“洮州人有歌曰：‘你从那来？我从南京来。你带得什么花儿来？我带得茉莉花儿来。’其地无茉莉，知此歌必为初移之民所遗留，至少亦是根据初移之民之遗语而咏歌者。”[7]这就是说，明初南京迁往洮州地区的移民大概有专门咏唱花卉或以花卉作为比

兴来唱民歌的风俗。

在北京大学所编的《歌谣》周刊第73号(1924年12月)上，曾刊登过顾颉刚青年时代所搜集的一首题为《孟姜女十二月花名》的南京民歌，从正月以至唱到腊月，共十二段，每段四句，每段的头一句都用一种花来起兴，咏唱孟姜女思夫的故事，如“正月梅花独占先”、“腊月里来水仙花”等等。就新中国成立前后所搜集到的大量花儿作品来看，用花卉来起兴或作为比喻的，为数也相当的多，如“正是杏花二月天”、“白牡丹白者赛雪哩”、“石榴花开在石崖上”、“园子角里水红花”、“胡麻开花是打蓝伞”等等。尤其是洮岷花儿中的《十二月牡丹》，更是以花喻人，是既唱花儿又唱人的杰作。这些情况，同顾颉刚文章中所引的那首民歌以及他早年所搜集的南京民歌不能说一点关系也没有。事实上，这些材料恰巧反映了花儿这个名称所唱的内容（不论是专唱花卉，还是以花卉做比兴）之间的一致性。为了深入探讨花儿这个名称的起源，这些材料是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真是无巧不成书，目前仍流行在宁夏地区的一种民间说唱形式，叫做“数花”的，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旁证。这种民间文艺形式，演唱时人数不限，少则三五人，多则五六十人，甚至百余人都可以，有说有唱，有问有答，街头巷尾、田间地头皆可演出。由于歌词每段开头都以花名和这种花的特征来起兴，然后引出内容，收尾合腔时再唱出这个花名，所以叫“数花”。这种形式来自何处？是如何演变的？与花儿有什么关系？似乎也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总之，我推测“花儿"这个名称，起先同它所表达的内容有着密切的关系，后来，才出现了用花卉之外的事物作比兴的作品。而最初定居于洮、岷、河、湟一带的汉民所唱的专用花卉作比兴的民歌，则是后来“花儿”的母体。至于用昵称作通称的说法，大约是后来才产生的，并不是“花儿”这个名称最初的含意。

四、从花儿本身所提供的材料来考察：花儿产生于明代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花儿数量的确不少，但由于它在历史上未曾受到应有的重视以及民间文学作品本身的变异性，原始形态或过渡形态的花儿，大都像一阵风一样消逝了，这就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不过，

民间文学作品口耳相传的特点，总能或多或少地保存一些传统的东西，只要我们努力去挖掘，从历史、地理、语言、风俗等各个角度去比较、分析，仍然可以看出一些早期作品的痕迹来。试举几例以说明之：

洮岷花儿中唱道："松树林里虎丢盹，看见尕妹担的桶，人品压了十三省。"这里的"十三省"，就很值得我们玩味。大家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明初沿用元代的行省制，将元代的十一省增加为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包括现在的甘肃）、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十三省。后又改称"十三承宣布政使司"，清康熙以后增为十八省，光绪时增至二十三省、四藩部。所以说，"十三省"乃是明初的概念，是指的"全国"。说这首花儿产生于明代，看来是恰当的。

岷县有一首花儿唱道："茶埠峪嘛龙王台，你到十一营上来；十一营上我不来，头没有帽子脚没有鞋。"多数人解释说，"十一营"，就是十一这一天的"逢营"（即农村集市），至于为什么把"集市"叫"营"，大家都没有说，而对"营"字后面的那个"上"字，更没有人去注意它。其实，"营上"二字是大有来头的，它竟是南京人的俗语。清代陈作霖所编辑的《金陵琐志五种》中的《凤麓小志》卷一中说："……骁骑仓下地广数亩，可以屯营，即骁骑卫之教场也，俗呼营上。"（骁骑卫乃明初南京的八卫之一，负责京城的保卫。迁都后，将其中六卫调往北京，骁骑卫亦其中之一）原来，明初的南京人把屯军的教场称做"营上"。这就启示我们：洮、岷一带屯军的教场，也被从南京来的移民称为"营上"。当时，之所以在校场附近设立集市，大约是由于军士们购买力较强，对小贩们有更大的吸引力的缘故。久而久之，就把"营上"当做"集市"的代称来使用了，"逢营"的"营"，只是"营上"的简称而已。这首花儿保存了南京移民的俗语，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洮岷花儿中还有这样两句："只要阿哥的心肠好，不要扯红绿的膝裤。"（扯，购买布匹之类，如"扯布去。"）后一句中的"膝裤"是什么？它是明代江南妇女的一种胫上着物，多用各色布、缎之类制成，饰以花边，系以银铃，走路时发出悦耳的响声。此物原先大约是为了便于劳动，用来束扎裤管用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